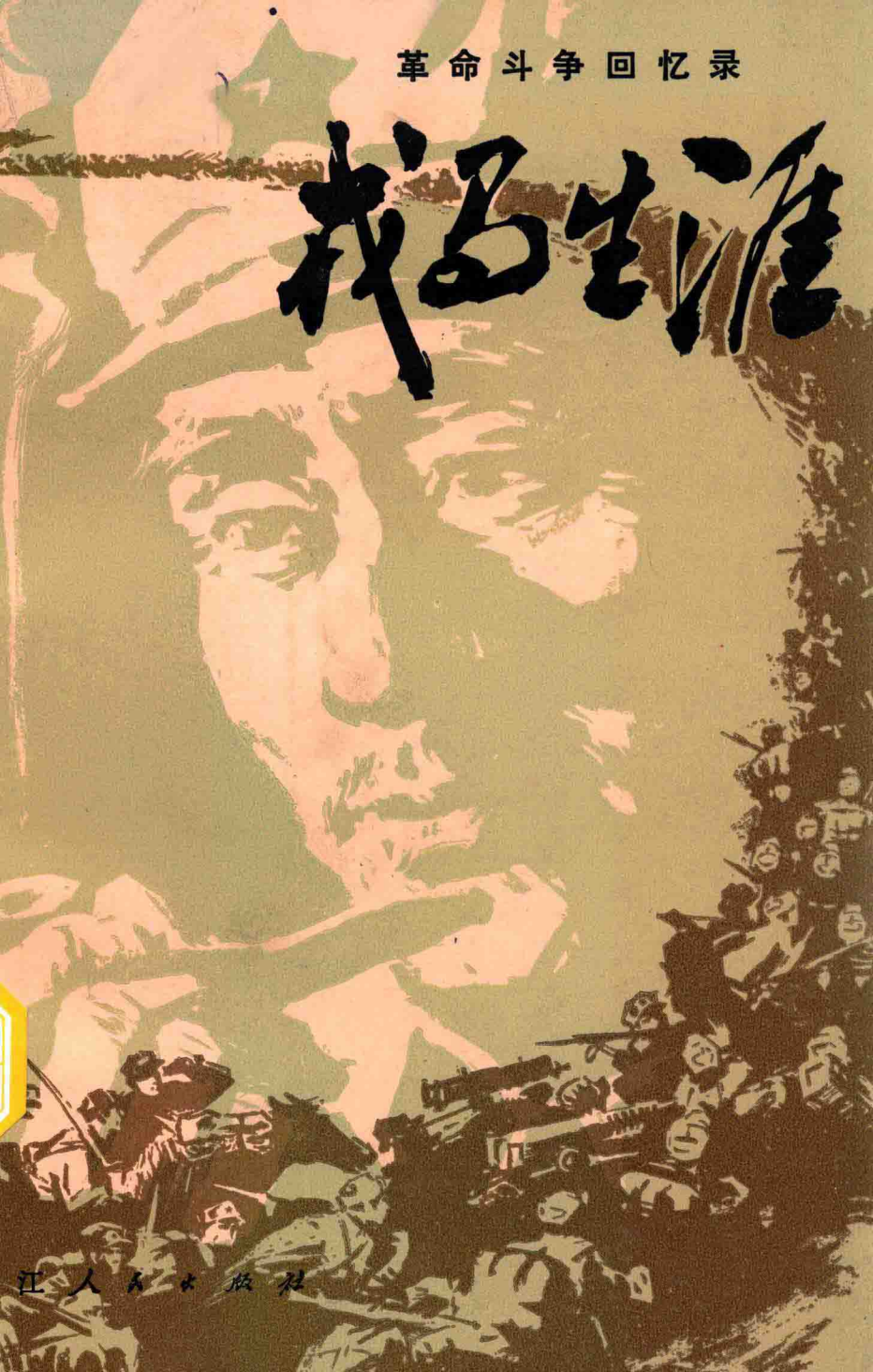


革命斗争回忆录

戎马生涯



江人民出版社

革命斗争回忆录

戎马生涯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革命斗争回忆录
戎马生涯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字数 133,000

1979年9月第一版

1980年3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8,201—68,200

统一书号：11103·32

定 价：(平)0.61元

前 言

在全国军民满怀胜利豪情进行新长征的时候，我们应广大读者的要求，选编了这本革命斗争回忆录，并拿它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

革命斗争回忆录是新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束鲜花。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革命文艺百花凋零。革命斗争回忆录同样受到摧残，被打成“为走资派树碑立传”而遭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地春回，文艺百花园里万紫千红，生气盎然。革命斗争回忆录这束灿烂之花才得以舒瓣绽放，这本《戎马生涯》也才有可能与读者见面。

这本集子所记录的是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实，至今读起来，依然亲切感人。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忠实地反映了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光辉业绩。在那些艰苦斗争的岁月里，面对着强大凶恶的敌人和极端困苦的物质条件，革命先辈怀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临危不惧，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坚持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在桃树岭浴血奋战的勇士，大战五桃木而壮烈牺牲的四十烈士，以及其他各篇中粉碎日本侵略者的“扫荡”、活捉李仙洲、把红旗插上南京城头、热血洒在钱塘江畔、挥戈东海解放舟山的无数英雄们，就是这种革命精

神和战斗意志的生动体现。正是无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丰硕的胜利之果！读了这些作品，使我们深深地懂得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使我们心中充满着对革命先辈敬仰和感激之情。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反革命政治纲领，颠倒是非，残酷打击迫害老干部。但是他们改变不了历史，磨灭不了革命先辈业绩的光辉！他们险恶的用心、卑劣的行径，只能使他们遗臭万年。

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进行新的长征，任重道远，征途上同样会有艰难险阻。我们应该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不畏艰险，排除万难，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编 者

一九七九年一月

目 录

前 言

生命的火花	林维先 (1)
赤卫军围困兴国城	钟发宗 (18)
“探囊取物”	周贯五 (25)
第一次考验	周长胜 (31)
西征第一关	李国厚 (38)
桃树岭创战功	林维先 (48)
三渡涪江	宋献璋 (59)
闯三关	林维先 (65)
黄河边上	周长胜 (74)
冀鲁边区生活片断	周贯五 (89)
反“扫荡”五日记	钱 钧 (94)
“无人区”升起了炊烟	钱 钧 (100)
五桃木四十烈士	周贯五 (108)
梁弄之战	刘亨云 (115)
一次思想大练兵	王若杰 (121)
谁种桃树谁收桃	周贯五 (132)

战斗在鲁南敌后的日日夜夜	宋献璋 (138)
活捉李仙洲	周长胜 (147)
红旗插上南京城	宋献璋 (158)
西子湖上的第一个春天	吴咏湘 (168)
进军舟山	张秀龙 (176)

生 命 的 火 花

林 维 先

我的家乡——安徽金寨县，是个老区。远在一九二四年，董必武同志和陈潭秋、萧楚女等同志就在那里领导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已经出现了农协会。党领导广大农民掀起减租、减息的斗争，以后，又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光辉照耀下，组织了多次农民起义，成立了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一连串的事情教育了我，一九二九年，我就参加了红军，并且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印象之深，好象刻在脑海里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始终不能磨灭。每当我想起这些，我就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毛主席。如果不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不说别的，就说象我这样的泥脚杆吧，早就饿死冻死填沟壑了。

谜

一九二七年，我十六岁，一不识字，二不懂事，标标准准是个地里娃。那年头军阀当道，土匪如毛，搞得鸡犬不宁。尤其是李老英那股土匪，足有上千号人，他们与官府相互勾结，专门残害穷苦的老百姓。见钱抢钱，见人抓人，他们一来什么东西都抢光，地皮都要刨三寸。老百姓暗叫他们为“阎王”，

一听到李老英那帮“拿枪的”来了，就扶老携幼、挑担背箩地逃上山去避难。

这一天，我正跟着父亲在地里耙土块，忽听到东头发出嚷嚷声，随着声音，又涌来一伙人，一边跑一边喊着：“拿枪的来了！”我赶忙放下锄头，跟着爹跑，由于急促，我的一件袄也丢在田畔上了。

我们一口气奔上山岗，找了一个安身的山洞，一直等到天黑。可是奇怪，今天山下倒很宁静，我想出洞去探探，又怕李老英那股强盗施诡计，不敢出去。

在黑黝黝的山洞里，好不容易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天一明，实在憋不住了，我第一个偷偷地溜出洞口，往山下一瞧，可怪，村里没有拿枪的，一堆堆的乡邻象在谈论什么。我们心里诧异，便急急忙忙往山下跑，一路上见到回去的人可不少。跑到转角上，人越来越多，挤得密不通风。我怀着好奇心，一股劲地往里钻，费了好大劲，才到了里边，一看就惊住了：我面前的那棵大树下，躺着三个肥头大耳的尸体，正是蔡家畈三个赫赫有名的财董。财董怎么会躺在这里？我望望周围站着的人们，人们脸上现出各种不同的表情：有高兴的，有表示惊奇的，有的正指手划脚地谈论这件事。我旁边正站着一高一矮两个人，那高个子喷了喷嘴，伸手指了指尸体说：“我看准是和李老英、李阎王闹翻了！也许少了钱，狗咬狗。”

“不，”那个矮的说，“要杀也不会三个一齐杀，李老英盼什么着？”他忽然放低声音，满有把握地说：“我看准是‘黑杀党’，是啊，准是他们。听说六安、霍山都搞过那么一回，这‘黑杀党’还专治财董哩。”

“‘黑杀党’，专治财董？”我的脑子里盘旋着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们是好是坏？天下最坏的就是财董，专治财董的还能

是坏人？他们在哪里？我想再打听打听，那矮汉已经钻出了人堆。

“问问看，也许这是一支专打不平的队伍。”好奇心促使着我。我跟着钻出人群，追上那矮汉：“你说的‘黑杀党’在哪？他们真是好人？”那矮汉给我问得一楞，停了一下，他拍拍我的肩膀说：“‘黑杀党’么，他们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小兄弟，你想想看，专治财董的人是好还是坏？”说完他嘿嘿地笑了。

我这才知道世界上拿枪的并不一样，还有一种拿枪的是专治富人的。可是，他们在哪里？此后，只要别人一提“红党”、“黑党”，我就竖起耳朵听着，竭力探求着有关“黑杀党”的谜。

暴 动

蔡家畈土豪被杀后，过了一年，一九二九的春天，金寨县、丁家埠、李家集一带终于掀开了农民起义的幕布。

三月，在皖西，天气还很冷，但在穷人心里却烧起了熊熊的烈火，大伙下田少了，村里也常常见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奇怪的是，在这些不相识的人中，有一个当兵的，矮矮瘦瘦的个子，他不象其他当兵的那样凶神恶煞、讲起话来吹胡子瞪眼睛。他态度和蔼，对人总是笑咪咪的；见到老年人，总是亲切地叫声“大娘”、“大爷”，或者是同他们拉拉家常，或者是帮他们劈劈柴，挑挑水。乡亲们也亲热地叫他“周班长”。更奇怪的是：我父亲，这个素来被称为老实人的老头，突然之间也活跃起来了，到我家里来找他的人也多起来了。我父亲还常常晚上外出，一搞半宿才回来。反正一切都异样了。

一天，我父亲打发我到离家十几里的姊姊家里去。就在那

天半夜，睡梦中听到一阵锣鼓声，我爬起来往外一看，只见丁家埠那头红光闪亮了半边天，人声枪声混成一片。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想回去看看，可是姊姊说啥也不答应。天刚亮，我连早饭也没有吃，就急着赶回家去，一路上过路的人群都在谈论着：“昨夜李家集出事了”，“丁家埠的农民暴动了”……。我走进村里，村里比庙会还热闹，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都在喜笑颜开地谈论着，比过年还开心。小孩在大人身边穿来穿去，大孩在村头做“打仗”的游戏。认识我的人，七嘴八舌地抢着告诉我：昨夜农民联合起来的队伍，冲进民团局子，杀了土豪劣绅，把民团的枪给缴了。我高兴得跳起来，真后悔没能参加这个真够劲的暴动。跑回家里，父亲也喜孜孜地对我说：

“昨晚冲民团局子，就是那个周班长、周维炯领的头呀！不是他，冲得开吗？他有勇有谋，抵不上诸葛亮，也抵得上赵子龙，真是一个大能人呀！”

原来，周维炯、萧方等几个同志在武昌毛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党派他们回到皖西搞兵运工作。周维炯同志打入了丁家埠民团，当民团的教练兼班长。他不仅在民团内部发展了十一名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而且在农民中建立了农协小组；积极准备武装起义。这年立夏节的晚上，周维炯按照党的指示，以过节为名，请丁家埠民团反动队长喝酒；他又以值星班长的身份，把担任警戒任务的两个岗哨换成共产党员，让民团的其他人员都来喝酒。你一杯，我一盏，几个共产党员轮番劝酒，把反动队长和几个不可靠的团丁，都灌得酩酊大醉。这时，规定起义的时刻已到，一声号令，民团局内外的起义群众一齐动手。早已埋伏在外面的农民，举着火把，拿着锄头、红缨枪、梭镖，冲向街头，杀进了民团局子。里应外合，一下把民团全部解决了。与丁家埠同时起义的还有李家集。农民纷纷起来，

斗地主，分粮食，烧田契。革命的星星之火，在皖西燎原了。

我父亲眯着眼睛光笑，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高兴，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扬眉吐气，脸上焕发的光彩，充满着希望和喜悦。

“周班长呢？那帮带头的人呢？”我着急地问，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黑杀党”，心里忽然亮堂起来。但是父亲没有再说下去，停了好一会，他走近我，说：“他们好是好，可就怕呆不久。你别乱跑！”父亲不放心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帮好人，怎肯放过这个机会呢？我下决心去看看他们。

红 军

我偷偷地走出了家门，迎面见到一个大兵，那汉子不太高，脖颈缠根红带，他见了我光点头微笑。说老实话，他尽管对我笑，可我还是害怕，我想起过去李阎王那伙拿枪的，瞪着眼睛、杀气腾腾的；我不敢走近他，不相信这大兵就是我父亲说的那些好人。我闪过一边，让那大兵走过去。他穿得还真利落，稳稳地迈脚步，连别人家场角上放着的东西也不看一眼。

跑到村西几家老乡家里，那里也有两个缠红领带的大兵，周围围着一堆人，我也凑近看看，只见一个老乡手里拿着钱，在和大兵推来推去。我问站在我旁边的老乡，说是大兵叫“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方才吃了一碗茶，硬要付钱，老乡不收他不依。

喝茶付钱，这可是新鲜事！别说见啦，连听也从没有听说过。过去那些当兵的到村里来，见鸡抓鸡，见羊牵羊，你说“老总呀，做点好事吧！”他揍你两拳，打你几耳光，算是对你客气的了。这个红军可怪。我看他们争了许久，最后还是那老乡输了，收下了钱。这一来，我的胆子也壮了，插上去问了

几句话。这一问可打开了这个红军的话匣子，他讲什么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穷人的部队，打土豪、杀劣绅，帮助穷人翻身闹革命……。有人叫他“事务长”，我也不知道事务长是做什么的。他们忙着买这买那，哪件买卖都是和和气气的。我心里捉摸，那伙杀蔡家畷财董的“黑杀党”准是他们，他们准是好人。可他光说红军、共产党。“黑杀党”三字连半个也没提。这时我才明白了，他们不叫“黑杀党”。他们就叫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我整天没事就跟着他们转。他们在村里住了几天，我差不多天天要抽空去聊一会，很愿意在他们那里，帮他们做点什么。

过了两天，我上姊姊家里去办事，在姊姊家里又遇见那个套红领带的事务长，他正在一间小屋旁为几大篮子菜发愁。我一看可高兴了，他准是缺人手，替他们做些事的机会来了。那时我年纪轻，个儿又长得高，一挑百十斤，一点不觉得什么。我刚想开口，姊夫正叫我：“弟啊！你帮红军挑菜去。”我急忙挑起担子就走。来回几十里，我挑得又高兴又起劲。一路上事务长夸奖我身体好，跑得快，还同我拉家常。他问我：“小兄弟，在家里日子过得还好吗？”我说：“什么好啊！种朱家地主老财的五斗山地，我爹，还有我们兄弟，整天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锄啊耙啊，累死累活，一年收下的谷子还不够交租呢！每年都要背八九十串钱的债。”事务长接着说：“穷人的苦就是地主老财的福呀，他们一不下地，二不种田，靠收租靠吸穷人的骨髓发财！这就是封建剥削。”他说的“封建剥削”我还弄不大懂，但知道地主老财确实都是靠收租子吃利息养肥的，没有一个好家伙。于是我又说：“还有一件事更气人哪。说起来这个老财还是我的本家，他叫林维冻。我家向他借了八串钱，利滚利，不到两年，他要我家还十六串。那年，我

们家宰年猪，准备敬神祭祖保佑我们来年有个好年景。这时林维冻跑来要债，他躺在肉案子上不让我们宰猪，硬要把猪捉走。”我越讲越气，事务长也越听越气。他好象马上要去为我报仇似的，问道：“他的人呢，现在他在哪儿？”我说：“他跑了，丁家埠暴动的那个晚上，他，还有姓朱的、姓萧的老财，都跑了。现在好了，我们穷人翻身了。”这时，我开心地笑了，觉得肩上的担子也更轻了，慢慢悠悠地往前走，希望路更长一点，同事务长在一起多呆一会。事务长听了我的话，沉默了好一阵，又严肃地说：“老财跑掉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被打倒，他们的老根没有挖掉！”我吃惊地问：“他们还有根子，根子在哪儿？”“对，他们还有根子，根子深得很，南京的蒋介石就是他们的总根子。”接着事务长又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我听得似懂非懂的。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着，不知不觉到达了目的地。我放下挑子，刚要走，他硬把三块银洋塞到我手里。这我怎么肯依他，给我们穷人的队伍挑菜还要钱，这象话吗？何况我是自愿帮忙的。我丢下钱，拔腿就跑。他追上来，说好说歹定要我拿着。还说我不收钱，就是要他“破坏红军纪律”。我只好拿着三块银洋回到家里，把这天遇到的事对父亲说了。临睡时，父亲叮嘱我：“你长大了，就去当红军，和他们一起干，要做红军那样给穷人出气的好人。”

革 命

自从和事务长一起挑过菜以后，我象着了魔似的，一心想参加革命，当红军。

一天，我跟姊夫从南溪往家里走。半路上，听到有人叫我，我回过头，原来是表兄。他穿着和红军一模一样的衣服，

姊夫告诉我，他已经是一个红军连里的连长了。我羡慕他，紧紧地瞅着他，心里有许多话想说，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于是就问：“姊夫当了赤卫队长，你呢？”

“我，没什么。”停了好一会，我不好意思地说。表兄又说，我参加红军年纪太小，还是加入少先队。“对！加入少先队。”我忽然被他提醒了，告诉他们马上加入少先队，一定革命。当夜我就去找村苏维埃的负责人，他答应了，并且要我明天晚上去开会。

第二天晚上，几十个大孩子挤在一间小屋里，村苏维埃的负责人在豆油灯下，给我们讲了话。然后一个套着红领巾的陌生小伙子，宣读第一批少先队员的名单。豆油灯的火苗子给风吹得忽闪忽闪，我们的心里也象火苗一样，烧得正欢。每读出一个名字时，我就紧张起来，不安地坐在凳上。突然听到喊“林维先”，我答应了一声“到”，连说带跳地站了起来，站在那里呆住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好。待别人拉我的衣角时，才知道我该坐下了。

加入了少先队，干一切都有劲了。我和少先队的伙伴们一起参加生产，一起拿着木棍站岗放哨，有时我们还做些宣传动员工作。后来我弄到一支土枪，那家伙，你可别小看，背上它真够劲，我真喜欢它。我背着它押过土豪、送过信。我们少先队常开会，组织生活也过得很严。小队长、召集人都是民主选举的。我们队员唯一的标志是臂上那块红袖章，别看那么一块红布，挂上它可真神气。

少先队的斗争生活，真叫人心情欢畅！转瞬之间到了七月。一九二九年的七月，大别山皖西地区，真是腥风血雨呀！我们少先队员在党的领导下，经受住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那时，国民党反动军队象无数头凶兽，向皖西猛扑过来。红

军为了保存力量与主力汇合，从金家寨、丁家埠、李家集撤走了。

红军一走，敌人又猖狂起来。恶霸、地主、土匪、坏蛋都回来了。他们的三件大事是烧、杀、抢。敌人把农协会会员、赤卫队员和村、乡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抓到南溪。不是砍头就是活埋。南溪的一条山沟里，横七竖八地填满了革命者的尸体。更残忍的是，敌人杀了人，还不让亲属收尸，丢在山沟里喂野狗。那些野狗吃人吃红了眼。没有几天工夫，村村狼烟，户户带孝。好端端的一个新苏区，被敌人折腾成为一片废墟。

在敌人回来后的第三天，一伙人突然闯进了我的家，不问青红皂白，把父亲五花大绑地捉走了。全家急得要命，到处求爹爹告奶奶，借债弄钱请人作保。费了好大劲，父亲在受尽酷刑后才被保出来了。我们用门板把他抬回来时，他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不到一个月便与世长辞了。父亲临死前，一只手抓着母亲，一只手抚着我的头顶说：“孩子，长大了给我报仇，要做个有志气的人。”说完眼泪水簌簌地从脸颊上流下来。母亲伏在父亲身上咽声痛哭。我跪在父亲面前宣誓：“我一定要报仇！”

父亲被折磨死了，可是敌人还不放过我家。姓萧的地主，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说我们分了他的东西，要退还。他揭了我家里的锅，砸了灶，拿走仅有的几颗粮食，还威胁说：“再不退还就要抓人了。”

我是满腔的怒火。在敌人皮鞭下的奴隶生活，再也过不下去了，我决心去找红军。可是红军走了，往哪儿去找呢？这时，党的组织怕我们这批少先队员再受损失，暗地里召开了队员会议，教育我们说，这次斗争是对我们一个严重的考验，千苦万苦，千难万难，不能投降，不能出卖自己人。要我们团结起来，逃到山里，伺机与敌人斗。

我们少先队员都宣了誓，把红袖章揣在怀里，每人带上一部分干粮，在乡邻们的帮助下，一夜间全部逃到了山上。还规定分散活动，定期联络。我们这一小队人是躲在猫儿岭。那岭真高，树很密，山路又凹凸不平，整整爬了一夜，到山顶拣了个山洞，里面铺上树叶，白天躲在洞里，晚上才偷偷出来活动。过了几天，敌人开始恶毒地封山、搜山，这下把我们的计划打乱了，有的队员跑散了，有的队员被捕了，山下又不能接济干粮，我们完全陷入绝境。高山深洞里，热天也要穿棉衣。我们不但要和敌人作斗争，而且还要和寒冷、饥饿作斗争。冷了，就团着身子；饿了，就摘山果野菜，舀泉水，啃树皮，几乎过着与原始人一样的生活。纵然如此，我们还是互相鼓励，坚持斗争。不知是谁，还编了一首山歌唱起来：

七月二十七，
红军游击到黄陂，
消灭敌人又缴枪，
得了胜利回皖西！

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愿望，坚定了我们信心，于是大家跟着一起唱。

我们盼呀盼，盼了三十八天，红军终于胜利返回皖西来了。当山下的乡亲带着红军来山上寻找我们时，我们兴奋得流下了热泪，从山洞里出来，插起我们的小红旗，用饿得没有力气的手，从怀里掏出红袖章。红军把我们一个个搂在怀里，激动地说：“你们胜利了，你们真是好样的！”

回到村里，村里住满了红军，比两个月以前多了好几倍。红军真的打了胜仗。你看，枪也多了，还有机枪、小钢炮。我